

共产国际的城市苏维埃理论与 毛泽东的农村苏维埃战略

胡厚荣, 王萍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8)

摘要: 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 强行照搬俄国革命苏维埃模式指导中国革命导致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挫折; 毛泽东则力求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 创造性地开拓农村苏维埃革命道路并取得成功。

关键词: 共产国际; 苏维埃革命; 毛泽东; 农村苏维埃

中图分类号: A4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2-0248-05

一、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针对中国革命形势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城市苏维埃革命的理论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坚持国共合作方针, 坚决反对成立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 共产国际也没有立即提出苏维埃的口号, 而是提出了一个“左派国民党”口号作为过渡。刊登于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上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告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仍留在该党内”,“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 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 并在这一基础上, 筹备召开国民党的代表大会。”^{[1](535)}这一不切实际的方针在实践中碰壁, 也遭到中共党内许多人的抵制。伴随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失误, 共产国际提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思想 and 行动要求。

7月26日,《真理报》发表《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 指出:“争取国民党的斗争的结局如何, 尚未得到最后的答案。但是, 国民党业已出现的重大危机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共产党人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

接着, 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国苏维埃问题。他说:“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 也许经过半年, 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 那么, 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 成为当前口号, 以与资产阶级政权相对立。”他又说:“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苏维埃, 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这表明, 斯大林此时还只是把苏维埃当作一个宣传口号。

从8月开始, 共产国际提出了将苏维埃从宣传口号变为直接行动方针的问题。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这个决议在谈到中国问题时, 明确提出了苏维埃革命的两个前提条件: ①左派国民党方针不能成功; ②革命出现高潮形势。同时, 决议也最明确地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苏维埃问题上的举棋不定: 既想开始苏维埃革命的尝试, 又不愿意抛弃国民党这面旗帜。这种模棱两可的思想, 致使中共党内出现了政策分歧。

到了9月份, 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建立苏维埃的行动要求。9月19日, 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10天之后, 中共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倡议下, 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承认“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 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 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9月27日, 斯大林在《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的演说中, 肯定和重申了中国革命已进入苏维埃

收稿日期: 2003-06-26; 修回日期: 2003-11-12

作者简介: 胡厚荣(1963-), 男, 湖南湘潭人,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时期的思想。他说:现在“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于舞台”^{[21](135)}。这表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已彻底抛弃了“左派国民党”幻想,转而在中国全力推行苏维埃革命。此后,苏维埃革命就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笼统地概括为苏维埃革命,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所谓苏维埃,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一贯思想,它既是起义机关,又是革命政权机关。作为起义机关,苏维埃只有在全国革命形势特别高涨,夺取政权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候才能成立;作为革命政权机关,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将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样的苏维埃不适合中国国情。

首先,进行苏维埃革命的首要前提是必须要有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共产国际同意在中国搞苏维埃革命,说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达到高潮,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显然,这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由于残酷的白色恐怖,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不仅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出现,就是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都没有出现。共产国际为了在中国造成苏维埃革命的形势,必然强迫中国共产党不顾客观可能到处盲目暴动,结果只能造成革命力量的更大损失。

其次,苏维埃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先占领中心城市,然后再把革命成果扩大到农村,这是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把这条道路照搬到中国,中共中央也全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理论。在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苏维埃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首先就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等建立苏维埃组织,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丢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共产国际把俄国城市中心的经验照搬到中国,片面强调城市苏维埃的重要性,显然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维埃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苏维埃革命是中国革命最后一个阶段,既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要打倒资产阶级,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是说,苏维埃革命既包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包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无所不包的革命,其实质就是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必然结果是把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中间阶层和中间势力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甚至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予以打击。苏维埃革命时期3次“左”错误都与共产国际这一指导方针有关。

苏维埃革命的提出并付诸实施,标志着共产国际完成了自大革命失败前夕开始的政策转变。从内容和实践效果来看,苏维埃革命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着相当的距离。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这一“左”的错误理论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时期连续出现了3次“左”倾错误。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共产国际苏维埃革命理论中诸如共产党领导、工农民主专政、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合理内容,大胆进行农村苏维埃实践,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

二、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实践中提出了农村苏维埃战略——工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对苏维埃的认识,最初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并无二致。由于身处斗争第一线,深感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毛泽东较之中共中央更热切的渴望尽快实行苏维埃革命。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徘徊犹豫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革命”之间时,他极力主张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当共产国际同意在中国实行苏维埃革命的消息传来,他“闻之距跃三百”,跃跃欲试之态溢于言表。当然,这个时候毛泽东所主张的苏维埃也是城市苏维埃,他“与彭公达‘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的计划,就是要打长沙”^{[31](215)},秋收起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攻长沙,夺取省

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这与中共中央关于秋收暴动的总体构想是一致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进攻中心城市的思想也是吻合的。

但是,毛泽东并未囿于各种条条框框。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既定方案,通知起义各部退往文家市。文家市会师后,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41(481,494)],毛泽东则审时度势,力主部队作战略退却,到湘粤边界坚持斗争。随后,毛泽东率部撤离了文家市,开始了向井冈山战略进军。1927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占湖南茶陵县城,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苏维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毛泽东此举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更不符合共产国际攻打中心城市思想和行动要求。因而被指责为“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单纯的军事投机”,受到“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51(50)]的处分,但毛泽东并未因此动摇。1928年1月,他指挥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领导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主持制定了工农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施政大纲》。2月,新城大捷之后,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宣告成立。至此,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基本形成。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经历了根据地“三月失败”和四月“朱毛会师”之后,毛泽东创建农村苏维埃的信念更加坚定。在会上,他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指出了根据地继续发展的条件,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会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茅坪仓边村成立,下设土地、军事、财政、政法等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等委员会。

1928年10月,毛泽东又在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为大会起草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它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分析、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把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坚持红色政权的主要原则,并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一步。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设想。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的割据,并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当晚,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和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向中央建议:“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旨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报告特别强调:“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4月5日,毛泽东在答复中央“二月来信”的信中,批评了来源于布哈林的分散流动游击主张,强调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复信还分析了南方几省的敌我优势,重申了前委长汀会议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了以一年为期,“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宏伟战略计划。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在这一宏伟战略计划的指导下,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以赣南、闽西为基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农村苏维埃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从而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乡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长期的反“进剿”、“会剿”、“围剿”斗争中,红军作战的全部战略战术原则也基本形成。其主要内容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在敌军“围剿”开始时,红军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战方针,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则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苏维埃

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红军发展到近5万人,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扩大到包括21座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成为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共产国际对农村苏维埃颇有微词,但在城市苏维埃计划一再受挫之后,最终还是承认了农村苏维埃事实

与农村苏维埃蓬勃发展的形势相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城市苏维埃计划一再受挫。共产国际在提出苏维埃革命之后,即开始在中国尝试建立城市苏维埃。为此,特意派来了诺伊曼这位暴动专家来华督阵。广州起义便是在其指导下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最初尝试。起义爆发当天就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对此共产国际给予极高评价,称其为“广州人民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尽管三天后即告失败,仍坚持“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的极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6]中共中央也认为,广州起义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证明了‘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适用的政权形式。’”^{[7](165)}

广州起义的失败,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与此同时,散布偏僻乡村的红军游击队却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是,当时的中央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却表现出忧心忡忡,对方兴未艾的农村游击战争不断进行指责与批评。共产国际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农村斗争没有城市无产阶级斗争相配合能否取得成功?共产国际的答案是否定的。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区就有这种危险)”。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共中央也把各地农村武装起义的暂时失败归咎于“缺乏城市领导”,并批评湖南省委自秋收暴动以来,“沉溺”于游击战争,“主观上只号召农暴而不要城市”,要求各地党部“恢复城市工作,建立城市工人对乡村的领导”,强调“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其二,处在农村环境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和红军能否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共产国际的答案也是否定的。1928年8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在共产国际“六大”所做报告中,认为中共党内“大部分党员不是工人阶级成分,而是农民。”从“唯成份论”出发,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红军的社会成份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要求红军应该“以工人为坚强核心”。中共中央接受了这种观点,在接连给各苏区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信中反复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城市工作“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重要城市”,要求“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以防止“被农民意识领导”。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和中国国内新军阀混战的日益加剧,促使共产国际重新燃起了占领中心城市、建立城市苏维埃的希望之火。10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宣称“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把军阀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把全民族的危机转变为直接的革命形势,用革命手段推翻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并要求中共‘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将‘广东、湖南、福建、湖北的工农红军的零碎竞争统一起来。’”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斯维尔特洛夫大学发表讲演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7](165)}。正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再三督促和摇旗呐喊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夺取武汉、长沙,建立城市苏维埃的再次尝试迅速遭到了失败。

共产国际建立城市苏维埃的努力再度化为泡影之后,面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拓农村苏维埃的成功,开始将目光转移向中国农村苏区,对毛泽东等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给了一定的重视。本来共产国际认为苏维埃只能建立在中心城市,只有能打硬仗的正规部队,方可称为红军。这时候被迫摒弃了昔日轻视农村苏区和红军力量的传统观念,开始将毛泽东等领导的“游击队”“农民军”称为正式意义上的红军。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指出:“现在这个时候,即是在阶级敌人的力量占优势的时候,如果不估计具体环境,不分析现在的工业中心点和最大的工业中心点的力量对比,而实行武装起义,这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

义”^{[8](412,416)}。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的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9](15)}表示了共产国际看重农村游击战争的意向。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开始要求中共把根据地“造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比较远的地方”,并督促中共“把各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发动起来,去积极支持苏区。”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共建立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中共将“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的工作”作为“第一等重要任务”,即农村苏维埃内。于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在日益重视农村苏区和红军的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苏维埃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赞扬和宣传。1931年9月,毛泽东领导苏区军民取得第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及时予以报道。11月4日,约尔克在《真理报》发表《中国苏维埃的新胜利》一文,正面报道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米夫也多次撰文赞扬毛泽东,给毛泽东予以极高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在日益关注中国农村

苏区和红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农村苏维埃区域的遥控和干预,并力图用城市苏维埃模式来改造农村苏维埃区域。秉承共产国际意旨,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王明等,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肃反、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并排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结果,第五次“围剿”不能打破,红军被迫长征,毛泽东等开拓的农村苏维埃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参考文献:

- [1]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2]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 [3] 余洒度. 关于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M]. 北京: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4] 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广东历史博物馆. 广州起义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7]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第1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8] 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0年)[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46)[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ory of Urban Soviet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at of Rural Soviet of Mao Zedong

HU Hour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s leadership didn't pay attention to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use Muscory's revolutionary model of Soviet in gui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le forcing to use muscorites' revolutionary model of Urban Soviet in gui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which gave rise to great loss and setback to the latter. However, Mao Zedong tried to start 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developed to take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road and won the final succes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son; soviet revolutioang MaozeDong; countryside soviet

[编辑: 颜关明]